

16/12

三门峡文史资料

(第二辑) 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三门峡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

三门峡文史资料

豫内资料准印证字第181号

水电部十一局印刷厂印刷

目 录

周总理与三门峡工程	季文选	(1)
卢氏涧北的洛师抗日游击队	张耀汉	(10)
投奔桂吾 共谋抗日	张耀汉	(24)
白狼口失陷，谁之罪？	张俊哲	(35) /
1944年大营农民的武装抗日斗争	孟裕民	(38)
豫陕中学学生生活的回忆	朱国华	(42)
日寇飞贼寿终时	杨得兆	(44)
血泪井	李本群	(45)
记豫西地区积极分子训练班	张廷钫	(46)
护送陕县同志	王万有	(50)
“头峪突围”记实	罗莹琳	(53)
杜江战斗	罗莹琳	(57)
全歼朱景武匪部记实	罗莹琳	(61)
忆陕南十二旅	关子烛	(63)
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1948年杨蔚屏同志给地委张玺、刘杰同志 的报告	张俊哲	(70)
张汴战斗	罗莹琳	(77)
陕县“联席会报会议”的反共活动	孟裕民	(81)

四十五里大奔袭	范君夫	(87)	
特务谋杀案的破获	陈月樵	(89)	
围歼曲有成“清剿队”始末	罗莹琳	(91)	
豫西民俗见闻录(续)	邓建华	(94)	
国家风味小吃——天津狗不理包子	段仁民	(107)	
《“土地陈报”给陕县人民带来的灾难》读后 ——兼谈“土地陈报”给陕东人民带来的灾难	姚英见	(111)	
“一贯道”在陕县的流传与覆灭	张俊哲	(116)	
基督教在陕县的传播 ——基督教长老王智新自述	张俊哲	牛学勤	(120)
陕县解放前后禁烟回忆	张俊哲	(124)	
1946年陕、渝划界的内幕	孟裕民	(127)	
铁骨铮铮 正气凛然 ——悼马致远烈士	张耀汉	(130)	
陈顺山及其民团军	张廷钫	(135)	
秦霆宇其人	孟裕民	(138)	
李群峨劣迹一斑	张俊哲	(144)	
盛际孝之死	张俊哲	(146)	
历史是人民写的	郭济群	(149)	
我童年时期的一段监狱生活	尤作贤	(153)	
忆原陕州打包厂女工生活片断	张俊哲	(158)	
昔日会兴镇散忆	乔紫亭	(161)	
观音堂兴衰见闻	乔紫亭	(164)	

上村刘娘娘

——历史传说	乔紫亭	(166)
慈禧回銮	吕之远	(168)
1950年的雹灾	陈根劳	(171)
三门峡市街名由来	陈长彬	(172)
鸡足山	乔紫亭	(175)
文史征集提纲		(179)
后记		(184)

周总理与三门峡工程

季文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举世闻名的一条复杂难治的河流。它以多沙、多淤、多决、多徙而著称。“黄河宁，天下平”，黄河的灾害问题，一直是“中国之忧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问题。一九五二年十月，毛泽东主席于百忙中视察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一九五五年七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确定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为根治黄河的第一期重点工程。从此，黄河的治理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黄河的事情我挂帅”。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领导治理黄河，并特别关怀三门峡工程建设，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作出的。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周总理曾三次亲临三门峡工地视察，给三门峡建设者以巨大的教育和鼓舞。

一

三门峡水库修建以前，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正常高水位如何确定这个关键问题上。一九五六年七月，国务院审查了三门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决定大坝按正常高水位三百六十米一次建成，一九五七年以前坝前水位保持在三百五十米。正常高水位的这种选择，对陕西省关中地区影响最大，因此反

映也最强烈。他们曾多次向去陕西视察的中央领导同志反映这个问题，要求可否降低一些，在这期间有的同志还建议正常高水位不需要三百六十米，三百三十五米即可满足要求，水库实行“拦洪排沙”的运用方式。

一九五七年初，为审查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专家会议，会议主持人是国务院副总理兼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主任邓子恢。参加会议的除各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外，还有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和黄河流域有关省的代表。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晚上八点，邓子恢、刘子厚、钱正英、李葆华、刘澜波、马兆祥等，向周总理汇报会议情况。邓子恢副总理首先摆了会议上的几种不同的观点，然后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组织建设、技术力量配备和机械设备情况进行了介绍。随后，由工程局局长刘子厚作了三门峡工地各方面施工准备情况的汇报。

周总理听完刘子厚的汇报后，在讲话中首先对工程局的工作进度和效率给予肯定，并赞扬了有些专家敢于直抒己见，提出相反意见的高度负责精神。然后说：“建设三门峡，是早就确定的项目。至于高坝大库这个方案，我想说两条：第一，苏联专家好的、正确的意见，必须积极采纳；第二、尽管在苏联曾被证明是好的、先进的、成功的东西，也必须要结合、照顾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决不能生搬硬套。”

对会上的几种不同意见，周总理表示，先不要匆忙表示赞称或反对。他说：“在做这个方案设计时，苏联专家根据我们的意见，为三门峡大坝设计了三种不同的高程。这三种设计高程各有利弊，具体按哪一种施工，中央和国务院准备听听我们自己专家的意见，所以没有急于开工。目前，我们

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把施工准备搞得更有把握一些。别看现在似乎慢了一点，只要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旦开工，才会有真正的快，真正的高速度。”

由于专家会议没能就设计方案统一意见，周总理决定：先由西安交通大学对整个三门峡库区进行一次模拟试验，分别按三种不同的坝高，测定一下汛期的最高水位情况，看看三门峡水库对西安市构成的威胁究竟怎样，并要求提供陕、豫、晋三省淹没地方和良田的具体数字。周总理说：“试验一有结果，马上报我，我还要向政治局和毛主席汇报。”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水利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至二十四日，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共七十人，在北京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会上大家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不应该修，三门峡水库的拦沙与排沙，水库综合利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绝大多数同志都认为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迫切需要的。多数意见认为排沙方案没有制止下游河道继续淤高，实际上没有很好解决防洪问题，也未能充分发挥水库的综合效益，大家一致同意水库分期运用，水位逐步抬高的原则。对于初期运用水位，大多数同志认为定在三百四十米高程比较合适。

一九五七年七月，水利部将讨论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遵照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对水库的各种规划方案，水库上游浸没影响，下游河道整治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召开了陕、甘、晋、豫四省会议，对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近期计划作了讨论，水利部于11月将上述意见进行综合，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国务院立即将该报告批转流域各省，要求组织讨论，提出意见，争取早日定案。在这同时，国务院批准了三门峡工程的初步设计。

对于技术设计，周总理明确指示：大坝按正常高水位三百六十米设计，三百五十米施工，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考虑适当增加泄水量与排水量，并要求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尽量降低。

二

三门峡工程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正式开工以后，施工进度很快，仅一年时间，即已开挖石方七十四万立方米，土方五百五十万立方米，浇筑混凝土三万多立方米，工地施工人数达一万多人。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决心将工期提前一年。当时的设计赶不上施工，如果再改变设计条件，苏联的设计工作就要推迟，工地势必要停工，损失将很大，因此都急于要中央早日定案。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明确三门峡工程的建设方向，周总理于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第一次视察三门峡，并在三门峡召开了现场会议。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多钟，周总理同彭德怀副总理、习仲勋秘书长以及水电部和河南、陕西、山西省的负责同志来到了三门峡工地。

周总理身穿银灰色制服，健步走过溢流桥，跨过神门河上的钢索吊桥，进入左岸工地，沿着木板搭成的人行道下来时，迎面看见身穿工作服的开挖分局团委书记刘冠三，周总理和他亲切地握手问道：

“是工人吗”？

“做青年团工作。”刘冠三答。

周总理听他说是做青年团工作，便又问：“动手不动？”刘冠三响亮地说“动手，我们和工人一起劳动。”

“做青年团工作应该和工人一起干。”周总理赞许地说。接着又勉励刘冠三：“可以学点技术，要又红又专。”

周总理走上隔墩，纵览了整个工地。刘子厚局长向周总理介绍了情况：围墙已经把左岸工地团团围住了，娘娘河已经被开挖掉，梳妆台炸平后，已压在围墙底下。现在正在浇筑混凝土围墙、隔墙、隔墩。

由左岸往右岸通过浮桥时，刘局长用手指着右前方对总理说：“这就是有名的中流砥柱。”周总理问道：“上面不是有唐太宗的诗吗？”刘局长答：“是的。”唐太宗的题诗是：“仰临砥柱，北望龙门，茫茫禹迹，浩浩长春。”自古以来中流砥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历代诗人为它留下许多美丽的诗句。

周总理踏上右岸公路，看见一群民工在吃饭就走了过去。“在工地吃饭啊！”总理问道。站在总理斜对面的民工张进洲，嘴里吃着馍。总理转过身来，从他手里把馍拿过来，掰了一块，放在嘴里吃着，并且说：“很好吃。”总理和民工们在交谈时，问：“你们都识字吗？学文化吗？”民工们说：“我们是半文盲，下了班学文化。”总理高兴地说：“那三门峡修好了，你们的文化也学好了。”

总理看完了下游钢桥，就走进正在安装的空压机房。在这里见到了电气安装的学徒工沙俊祥，总理同周围的人：“他怎样？”在一旁的工人告诉总理：“工作很好，就是有点调皮、贪玩。”总理笑着说：“小孩子嘛，不调皮怎么长大的。”他怀着对青年一代无限关怀对沙俊祥说：“应该好好向老师傅学习。”

在空压机房内，总理碰到了动力分局主任工程师钱汝泰，他正在这里指导安装机器。总理问：“你是管什么

的，”钱汝泰回答说：“管施工用的风、水、电。”总理风趣地说：“真不简单，封神榜上的风、雨、雷、电四大金钢，就被你管了三个！”

从工地回到三门峡交际处的时候，早已过了午饭时间，总理匆匆吃了一点饭，马上召集开会。

这次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水库会议，在工程局大楼四楼会议室举行。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强调“特别要听取反面意见”。不论哪位同志发言，总理都走过去坐在发言者的身边，认真听，详细记，时而还插问几句：“怎么，就这些了？”“这个问题还没说完嘛，继续说，继续说。”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大家的分歧逐渐集中到工程效益问题上。

在这次会议上，陕、豫、晋、水电部、黄委会、工程局的负责人以及有关方面的专家都发了言，彭德怀副总理、习仲勋秘书长也讲了话，周总理最后作了长达二万多字的总结发言。他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深刻阐述了上游与下游，一般洪水与特大洪水，防洪与兴利，局部与整体，战略与战术等辩证关系，明确指出三门峡工程的目标应以“防洪为主、其它为辅”，“先防洪、后综合利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原则。

周总理还特别强调“不能孤立地解决三门峡问题。”“一搞三门峡就只依靠三门峡，”“要同时加紧进行水土保持，整治河道和修黄河干支流水库。”并布置尽快搞出这三个规划。周总理鼓励大家要有理想，有气魄，改变黄河流域的面貌，变华北如江南，这完全可能。我们所在的纬度很适中，和欧洲比，欧洲在我们纬度以北还比我们绿化得多。我们河南、山西、陕西等的纬度也都在三十至四十度，这里的

纬度相当于欧洲的意大利、法国。

周总理曾多次提出降低三门峡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的问题。由于苏联方面认为闸门启闭有困难，最多只能降低三百一十米。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又再次强调提出：“还可以争一争，看是不是能降到三百米。”对于水土保持减沙效益，当时有的同志越估越高。周总理当场指出：“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由于周总理的民主作风好，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从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总理、彭副总理、习秘书长，山西芝罘省长陪同视察了陕县大营农业生产合作社。

三

一九五八年六月，在周总理主持下，又邀集黄河流域有关省的负责同志进一步交换意见。六月二十九日水电部党组根据研究的意见，进行了综合，向中央写了《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根据周总理主持的两次讨论会上明确的几条原则，最后一致同意：三门峡大坝按正常高水位三百六十米设计，三百五十米施工，一九六七年前水库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三百四十米，死水位降低为三百二十五米，泄水孔底槛高程降为三百米。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二日晚，为了研究解决三门峡工程拦洪、发电问题，周总理又来到了三门峡。下车后立即召开会议，直至深夜。十三日上午，周总理第二次视察三门峡工地。陪同视察的有水电部、石油部、农业部、河南、山西、陕西、湖北、长办、黄委，三门峡市和工程局的负责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月八日，周总理第三次来到三门峡。他这

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贵宾来三门峡大坝参观的。周总理等先视察了三门峡水工机械厂，和工人们亲切握手交谈，观看了炼钢情况。接着又视察了三门峡大坝。他勉励工人们“为三门峡工程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四

一九六零年九月，三门峡工程以提前一年多的高速度基本建成，蓄水运用。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最高蓄水位曾达到三百三十二点五八米。由于缺乏在黄河上修建水库的经验，对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运用后，库区淤积的严重程度超过了预计。从一九六零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汛后潼关河床抬高了四点五米，三百三十五米以下库容损失百分之四十，年平均损失库容由原估计的三点七亿立方米增加到十亿立方米。

在三门峡工程面临兴废抉择的严峻关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召开了专门解决三门峡问题的治黄会议，周总理发表了《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总理在《讲话》中说：“本来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事，请计委批准就可以了，可是有些意见出入比较大，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还不安心，因此挤出时间来参加这次会。”在会上总理不是急于拍板定案，而是耐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为了让大家解放思想，敢于畅所欲言，周总理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大家敢于大胆地设想，并不是主张炸坝。”“因为我不这样说，别人不敢大胆地想。”对于三门峡工程的失误，周总理没有责备下面的同志，而是鼓励大家说：“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摸索规律，不断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

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周总理说：“提出两洞四管改建方案，是在想不出好办法的情况下救急办法。”

“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最后依次征求有关各省和业务部门领导同志的意见，才决定批准两洞四管改建方案，即在左岸增建两条隧洞，改建坝身四条发电引水钢管用于泄流排沙。

此后，周总理一直很关心三门峡工程改建这件事。一九六五年托李先念副总理来河南了解改建方案执行情况。一九六九年又委托河南省革委在三门峡召开会议，研究第二次改建任务。一九七零年总理在北京接见黄河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和长办主任林一山时，在谈话中还特别关心三门峡工程改建的效果。直到一九七五年总理已重病在身，中央领导同志去医院看望他时，他还询问三门峡工程改建后的情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真是为三门峡工程操尽了心！

现在可以告慰周总理在天之灵的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经过原建和两次改建，在防洪防凌、灌溉和发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已有五台五万千瓦小轮发电机陆续并网发电，到一九八六年五月底已累计发电一百零五亿七千万度。仅发电一项的效益就已收回国家对三门峡工程的全部投资。

卢氏涧北的洛师抗日游击队

张耀汉

一、洛阳师范是我省富有革命校风的学校之一。

解放前的河南省立洛阳师范，是我省富有革命校风的学校之一。解放军纵队司令员韩钧、西南政法学院顾问杜自珍、咸阳军分区副政委杨自立、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副厂长陈子捷、中国音乐学院周建国……等，都是洛阳师范先后毕业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滥炸古城，洛阳师范迁到卢氏涧北，男女学生12班，全部实行军训。迁卢伊始，社会秩序不太安定，学生曾持枪击毙土匪头子李万宣，声震全县，稳定了卢氏县西的社会秩序。当时，洛师党支部常趁假期举办补习班，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化补习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一九三九年暑假，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向文（河南巩县人）主办洛师补习班，领导青年学生学习《大众哲学》、《游击战争讲话》、《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朱德传》、《毛泽东自传》、《社会科学廿讲》……等进步书籍。当时我参加了学习，张向文同志中途被捕。补习班毕业的学生，都先后分别考入省立洛中（卢氏城内文庙）、省立洛职（卢氏北苏村）、十一区农林学校（卢氏城隍庙）、私立许昌进德中学（卢氏城东高村）、私立萃原高中（卢氏文庙路北）、萃原初中（卢氏南大街）、战地中学（卢氏下留村……为地下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武装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如果日寇进犯豫西，我们就拉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赵致平同志任卢氏县委书记，化名刘尊实。有次我到文华书店找他，李茂林同志（卢氏城关地下党负责人）对我说：“老刘到栾川陶湾去了，他说陶湾群众基础好可建根据地。一是遇荒年发动群众交犁耙（组织农民暴动）；再是如果日寇进犯豫西，我们就拉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因此，玩枪、拉武装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一定的兴趣。对军事训练，开始重视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的学习。每次打靶，200公尺的12环靶型，我能枪枪不脱靶，中环数是同学中最高的，受到了洛师历任军事教育王中柱、曲云璋、王延历的赞誉。洛师军训枪支除50余支是光华书局生产的教练枪外，其除十余支步枪均可实弹射击。“九·九”重阳节那天赴熊耳山旅游时，十余名持枪者都由我带领，为以后掌握洛师枪支，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纠集五、六万兵力，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汤恩伯等指挥的四十万军队，不战自溃。豫西各县，相继沦陷。当时我在卢氏涧北省立洛师刚刚毕业，部分师生向西逃亡，大部学生离校回家。我和杨自立（洛宁人，解放后曾任咸阳军分区副政委）、陈子捷（洛宁西寨人，乌鲁木齐石化总厂副厂长）、周建国（渑池姜庄人，解放后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后调中国音乐学院）、黄生学（渑池人，曾在县教育局工作）、朱毓坤（洛宁张村人，洛宁教师进修学校教导主任）等同学留校组织洛师学生抗日游击队。男生百余人分两个中队，我任第一中队长，黄生学任第二中队长，下分六个分队。女生50余人，教师及其家属共200人左右。学校原只有十余支步枪，人员组成